

中国领导层的中期角逐：加速备战 2012

（系列第一篇：省级负责人）

作者：李成

中国将在 2012 年的第 18 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更换主要领导人。当前许多最高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预计均将退休。大量新的面孔将进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谁是这些最高领导机构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新晋者的主要性格特征和晋升标准是什么？我们能否敏锐地预测出可能的领导集体阵容和权力的派系分布情况？新一代领导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通过研究中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 62 名省级负责人——党委书记和行政长官，本文试图阐释上述问题和其它相关问题。毫无疑问，在今天的省级负责人中将会产生明天的国家决策者。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测，在这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以及之后，这些领导人中的一部分将会统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与美国一样，2012 年对于中国的政治家而言也将是重要的一年。自 1977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每隔 5 年定期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一直是中国最高领导层更替的重大事件，预计将于 2012 年秋季举行的中共第 18 届全国代表大会也不例外。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 9 名成员中将有多达 7 人预计会退休。在 25 人的政治局中，至少将有 14 名领导人空出他们的席位，让位给更年轻的候选者。因此，2012 年之后的新晋者将成为负责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和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军事运作等事务的主要人物。¹

尽管北京方面的领导人大换班感觉仍很遥远，但是中国的政治家们却已经开始行动。当然，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中期选举。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角们而言，美国的中期选举实践仍是一种外国新事物，但正如“中期”在美国代表将要举行的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重要中间节点一样，中国的政治时钟也遵循着明显相似的节奏摆动。在主要竞争者及其所在派系之间，对于权力的激烈角逐至少在“领导权更替之年”之前两年就已经开始升温。

这一特殊时间段主要是中共最近制定的规则和标准的作用，其中要求高级官员（县长及以上）在获得提升之前至少需要任职两年。²想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候选者们在当前及未来的数月中必须精明地找准定位，在中央或省级领导层中占领党和政府内的晋升阶梯。

因此，对于中国观察家而言，分析这些显要职位的在职者——尤其是在最近的洗牌中新获任命的人——就极有价值。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四个重要目标：1)揭示下届政治局可能的领导阵容，包括常委会成员；2)展示新一届领导人的政治和职业个性，包括年轻一代中冉冉升起的新星；3)评估 18 大之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派系权力平衡；4)预测新领导层之下的国家政治轨迹和政策导向。

本文是关于中国政治家在迈向 2012 年领导层更替过程中的权力角逐的专题系列第一篇。本专题将审视一些最为重要的权力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主要国有企业以及军队。第一篇文章聚焦于当前的 62 名省级主要负责人——省级党委书记和省级行政长官，他们分属于 31 个省级行政区。³文章综合、实证地分析了这 62 名省级领导人的个人背景、教育资质、职业生涯和政治网络（或者说派系身份）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经验分析。除部分与他们的派系渊源和家庭背景相关的信息之外（这些信息基于作者的访谈和非官方的中国媒体而来），所有数据均来源于由中国政府运作的新华社的网站。⁴

这 62 名省级负责人或许是观察中国正在上演中期角逐的最重要群体，因为中国的省级领导层既是国家领导人的训练场，又是不同政治力量的角斗场。省级层面的权力派系分配与国家层面一样鲜明，因此值得我们注意。分清楚省级负责人的晋升途径是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胡锦涛的权力基地）、身为“太子党”（指那些有高干家庭背景的领导人），还是身为“上海帮”成员（曾是江泽民执掌上海时的部下的领导人），是预测今后数年内中国政治版图的最佳途径之一。

省级领导层：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关键跳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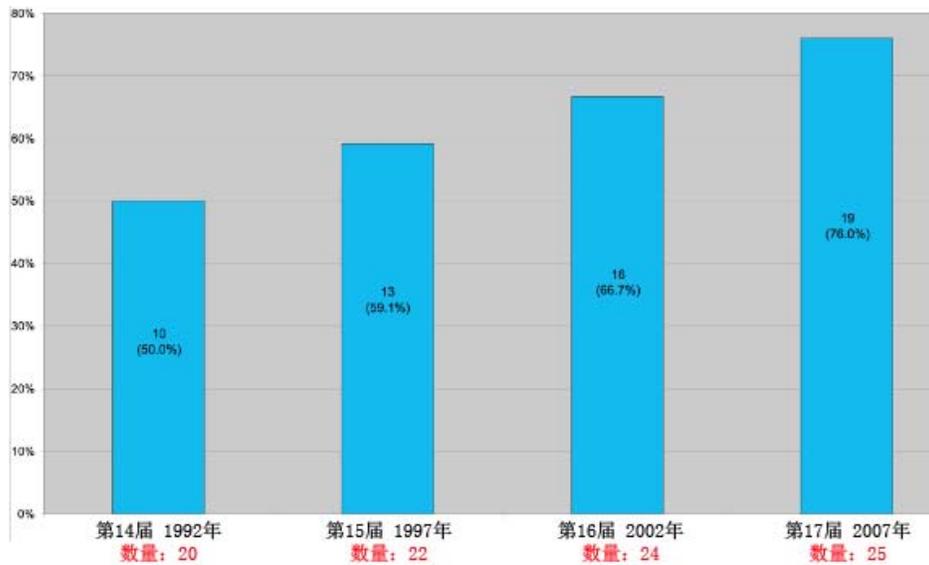
中国的省级负责人在当前的国家治理中承担着巨大的政治比重，这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些领导人治下的省或直辖市都是大型社会经济体。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那就是一个省对中国而言就相当于一个国家在欧洲而言。事实上，中国的省份在人口上超过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例如，中国人口最多的 5 个省份（河南、山东、四川、广东和江苏）的人口超过西欧人口最多的 5 个国家（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⁵河南省现在拥有 9970 万人，预计将于 2010 年 7 月超过 1 亿。⁶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只有 10 个国家的人口超过 1 亿。⁷这些省份的经济意义也同样重要。例如，广东省的总 GDP 已经超过“东亚四小龙”中的三个（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广东省省长最近宣布，该省的 GDP 将会在 10 年内超过另一个“小

龙”韩国。⁸中国的省级负责人们就像欧洲国家和东亚四小龙的最高领导人一样，持续关注区域经济发展，并且要应对巨大的挑战，如失业、公平分配、社会稳定、医疗卫生和辖区内人民的福利需求。

其次，中国的省级领导层本身就是一股政治力量，而如果省级政府拥有更多自治权来推进各自的地区利益，那就更是如此。尽管他们通常处在幕后，但他们仍会时常参与政治社交、政策游说、在他们自己之间和中央权力之间建立联盟。过去15年间，中共最重要的两次政治清洗发生在两位兼任省级负责人的政治局委员身上，这并不是巧合，其中第一位是1995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第二位是2006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通过在省级层面上清除掉这两名强大的政治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近两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得以巩固他们在中央政府中的权力和权威。最近，省和地方政府的“驻京办”数量增长迅速，它们是以地区为基础的中国游说团体。2010年1月，中央政府发布了新规，大量减少获批的代表地方利益的驻京办数量，并且要求对剩余的省/市级游说团体进行财务审计。⁹

第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省级负责人的职位一直是进入国家领导层的关键跳板。这一时期内绝大多数中国最高级领导人，如第三代的江泽民和朱镕基、第四代的胡锦涛和吴邦国、第五代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在进入北京就任国家最为显要的领导职位之前，都曾担任过省或直辖市的党委书记。在现任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中，除总理温家宝之外，其余全都有担任省级负责人的经历。最高领导层中正在兴起的6颗新星也都曾担任过或现任省级负责人，他们都是属于第五代的政治局成员。¹⁰图1表明，政治局中拥有担任省级负责人经历的成员比例增长显著，1992年为50%，1997年为59%，2002年为67%，2007则达到了76%。对于文职领导人而言，担任省级负责人的经历几乎已经成为入选政治局的先决条件。

图1 拥有担任省级负责人经历的政治局委员的增长比例



来源：李成：“关键跳板：第17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地方领导人代表”，《中国领导观察》，第23卷（2008年冬季），第3页。

此外，在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所有的省级负责人都会自动成为候选人，通过投票获得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资格。¹⁴例如，2007年第17届中央委员会成立时，31个省级行政区的党委书记和行政长官全部都在委员会中获得了正式委员席位。尽管我们知道省级负责人可能很快就会提升到中央政府或者调到其它省份，但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仍然会严格执行这种安排模式。这种模式使得省级负责人这一群体在200多个中央委员席位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表1列出了现任省级负责人在第17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席位情况。其中有6人是现任政治局成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41名省级负责人（占总数的66%）是第17届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12人（占19%）是候补委员。现任省级负责人中95%都在第17届中央委员会中任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位置更有利于谋求更高级别的职位。

表1 现任省级负责人在第17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的任职情况(2010)

委员资格状况	领导人人数	百分比
政治局委员	6	9.7
正式委员	41	66.1
候补委员	12	19.4

中纪委委员	1	1.6
以上都不是	2	3.2
总计	62	100

注：中纪委即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

3名省级负责人没有进入第17届中央委员会，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1955年生）、新任命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1952年生）、新任命的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1951年生）。巴特尔现任第17届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委员，之前是15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们三人都有望成为第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巴特尔的少数民族背景和丰富的领导经验使其在进一步的仕途晋升之路上更具优势。所有这些因素均表明，中国的省级负责人具有极大的政治比重，在即将召开的第18届党代会上，他们是国家领导人职位的有力争夺者。

第18届党代会上预期的领导层大规模更替

尽管中国的政治体系在本质上是权力主义和一党专政，但是中共的领导层在过去三十年中却明显地具有较高的更替频率。事实相当明显，1982年第12届中央委员会中新成员占60%，1987年第13届中这一比例为68%，1992年的第14届中为57%，1997年的第15届中为63%，2002年的第16届中为61%，2007年的第17届中为63%，平均更替率为62%。¹²根据现任中央委员的年龄分布和之前党代会的更替率，我们可以粗略地估计，第18届中央委员中的60%将会是新面孔。

在中国主流精英圈中，领导人的年龄是其未来政治前景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按照中共的规则和标准，特定级别的领导人年龄不能超过一个设定的限制。例如，所有省级负责人在到65岁时都会被要求让位，只有那些年龄低于63岁的才能在一开始成为候任人选。在2007年的第17届党代会上，所有1940年之前出生的领导人，包括当时的政治强人国家副主席曾庆红（1939年生）在内，都不允许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任职。这些退休年龄限制不仅确保了领导人更替方面的连贯和公平，而且使中国的政治精英更换速度非常迅速。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谁将会进入或者退出最高领导层？如何读懂北京的逻辑？对于外界观察家而言，这些问题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难以回答。

表 2 详细列出当前 25 名政治局成员在 2012 年的 18 大之后可能的仕途前景。考虑到上届党代会上允许的最早出生年限是 1940 年，对于即将到来的党代会而言，当局很有可能选择 1945 年作为最早出生年限。如果真是这样，则至少有 14 名成员（占总数的 56%）将会退休。9 名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两人（即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出生于 1945 年之后，因此，会允许他们保留各自的席位。习和李被广泛认为是“两大当然继承人”。其余 7 人（占总数的 78%）都可能会将席位让给更年轻的现任政治局委员，其中最有可能的是李源潮、王岐山、刘云山和张德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和副总理王岐山现在分别负责中共的人事和国家金融发展事务。负责这两大关键领域已经使李和王的政治比重相当大，而且预计他们将在今后几年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和副总理张德江已经连任了两届政治局委员，很有机会提升为常委。

在政治局的 16 名非常委成员中，除了上述 4 人可能晋升为常委之外，至少有 7 人将会因为年龄限制而让位。其它权力机构（如中共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也将获得部分席位。例如，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书记处书记令计划极有可能在下届政治局中获得一个席位。作为胡锦涛的亲信，令甚至有可能晋升为政治局常委，这与 2002 年时发生在江泽民的亲信曾庆红身上的情况一样。¹³ 然而，现任的省级负责人们很有可能占据这 14 个公开席位中的绝大多数，包括 3 个常委会席位（假定政治局常委会仍然设置 9 个席位）。

表 2 现任政治局委员在 2012 年 18 大之后的仕途前景

姓名	出生年份	2012 年时的年龄	18 大之后可能的政治地位
胡锦涛	1942	70	退休
吴邦国	1941	71	退休
温家宝	1942	70	退休
贾庆林	1940	72	退休
李长春	1944	68	退休
习近平	1953	59	留任常委
李克强	1955	57	留任常委
贺国强	1943	69	退休
周永康	1942	70	退休
王刚	1942	70	退休
王乐泉	1944	68	退休

王兆国	1941	71	退休
王岐山	1948	64	晋升为常委
回良玉	1944	68	退休
刘淇	1942	70	退休
刘云山	1947	65	晋升为常委
刘延东	1945	67	退休、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李源潮	1950	62	晋升为常委
汪洋	1955	57	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张高丽	1946	66	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张德江	1946	66	晋升为常委
俞正声	1945	67	退休或晋升为常委
徐才厚	1943	69	退休
郭伯雄	1942	70	退休
薄熙来	1949	63	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注：加阴影部分为现任政治局常委。

当然，要说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各个竞争者的政治前景已经确定，还为时过早。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权力从胡温向习李过渡也并不是一个必然结论。正如美国政治一样，中国政治中也会有黑马出现。然而，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应该更加关注更广泛群体中的潜在权力竞争者，尤其是省级领导层中冉冉升起的新星。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即将召开的第 18 届党代会上的人事变动将标志着所谓的第五代国家最高领导集体的全面掌权。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一再显示的那样，每一代领导人都会带来可以清楚感知的统治方式、不同的施政方法和带有个人特性的热点议题。了解中国未来第五代和第六代领导人——尤其是作为未来领导人最重要的补充来源的省级负责人——的集体个性或代际特征，是一项与找出最高领导层的有力竞争者同样重要的任务。

62 名省级负责人的实证分析

性别、民族、年龄和出生地

表 3（见下页）提供了这 62 名省级负责人的个人信息概况。丝毫不足奇怪，这 62 人中只有一名女性，即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她于 2009 年 11 月获此任命。与过去 10 年中的情况相同，只有一个省级负责人的位置被女性占据。2000 年，蒙古族女性乌云其木格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最近，宋秀岩曾任青海省省长，她

现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孙春兰生于 1950 年，1969 年参加工作时是辽宁鞍山一家手表厂的工人。她曾担任过中国共青团的基层干部、厂长、厂党委书记，并曾在省市两级妇联中担任过主席。她在 2001 至 2005 年间担任大连市委书记，在 2005 至 2009 年间担任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孙从 1997 年的 15 大即进入中央委员会，是第 17 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的官方媒体最近曾将孙比作中国领导层中的另一个“吴仪”。¹⁴她是下届政治局委员中少有的女性候选人之一。¹⁵其他可能与之竞争的女性领导人包括上面提到的宋秀岩（1955 年生）、监察部部长马馼（1948 年生）、司法部部长吴爱英（1951 年生）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1957 年生）。

有 6 名省级负责人属于少数民族群体，其中包括中国全部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席：宁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回族，1957 年生）、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飏（壮族，1954 年生）、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蒙古族）、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1961 年生）和新近任命的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藏族）。2002 年，全国人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其中规定所有民族自治区域的地方政府最高领导职位应当由具有同一少数民族背景的合法公民担任。¹⁶只有一名少数民族领导人担任省党委书记，即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回族，1946 年生）。尽管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都由少数民族领导人担任主席职务，但毫无例外，汉族领导人担任着这些区的党委书记职务。

表 3 省级负责人的个人背景（截止 2010 年 2 月）

	人数	百分比
男性	61	98.4
女性	1	1.6
民族		
汉族	56	90.3
少数民族	6	9.7
平均年龄范围/（出生年龄范围）		
66-70/（1940-1944）	2	3.2
61-65/（1945-1949）	21	33.9
56-60/（1950-1954）	29	46.8

51-55/ (1955-1959)	6	9.7
46-50/ (1960-1964)	4	6.5
最集中的 6 个出生地		
山东	8	12.9
浙江	8	12.9
河北	6	9.7
河南	5	8.1
江苏	5	8.1
安徽	4	6.5
来自 6 个最集中出生地的省级领导人人数	36	58.2

资料来源：新华社，作者计算。

副总理回良玉（回族，1944 年生）是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唯一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人，但是由于年龄关系，预计他将让位。几乎可以肯定，至少会有一名少数民族领导人进入下届政治局。候选人包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蒙古族，1953 年生）、全国工商联党委书记兼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朝鲜族，1952 年生）以及上面提到的巴特尔、马飏和王正伟。

表 3 中，只有两名省级负责人已经超过这一级别领导人的退休年龄。他们分别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1942 年生）和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1944 年生）。他们二人都是现任政治局委员，预计在 2012 年会退休。一些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的省级负责人仍旧有在下届政治局中获得席位的机会，但大多数都会在随后的数年中退休。其中有部分人预计将很快让出省级负责人的职位，包括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1945 年生）、宁夏区委书记陈建国（1945 年生）、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1945 年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1946 年生）、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1946 年生）、广东省省长黄华华（1946 年生）、福建省省长黄小晶（1946 年生）和浙江省省长吕祖善（1946 年生）。

有 35 名省级负责人（占总数的 56.5%）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此，他们还将在很多年内保有各自的职位，并且还有可能获得晋升。表 4 列出了现任省级负责人的任期长短。根据中共的规定，每名领导人在同一职位上最多只能有 2 个 5 年任期。只有一名领导人是个例外，即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政治局委员）他从 1995 年担任现职至今。很显然，中央当局开此例外是为了控制民族关系日益紧张的地区。50 名省级负责人（81%）是在 2006 年之后获任现职的，他们仍在各自的第一个 5 年任期之内。从表 4 中明显可见省级负责人的更替非常迅速。

表 4 现任省级负责人的任期长短

获任现职的年份	领导人人数	占总数的百分比
2000 年之前	1	1.6
2000	0	0
2001	1	1.6
2002	2	3.2
2003	4	6.5
2004	0	0
2005	4	6.5
2006	2	3.2
2007	22	35.5
2008	14	22.6
2009	10	16.1
2010	2	3.2
总计	62	100

资料来源：新华社，作者计算。

有 4 名领导人生于 1960 年代，即内蒙古党委书记胡春华（1963 年生）、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1963 年生）、湖南省省长周强（1960 年生）和前面提到的新疆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他们属于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代领导层。在第 17 届中央委员会的 371 名成员（包括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 25 人(6.7%)生于 1960 年代,他们当中只有 4 人为正式委员（即胡春华、孙政才、周强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他们相对年轻的年龄和在关键领导层的经历使他们在未来的领导人竞争中极具竞争力。

表 3 列出了中国现任省级负责人出生地最为集中的 6 个省份。约 58% 的领导人出生于这 6 个省，约 40% 出生于东部的 4 个省（山东、浙江、江苏和安徽）。中国 4 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的 8 名直辖市级负责人中，7 名出生于华东地区。这一发现印证了近期若干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出生于华东地区（尤其是山东、江苏和浙江）的精英们拥有超额代表地位。¹⁷ 而且，2012 年后高层职位的竞争者中，占有先机的若干人都出生于安徽（那里也是胡锦涛、吴邦国和李克强的出生省份），这些人包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955 年生）、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1953 年生）和辽宁省委书记王珉（1950 年生）。

表 5 列出了与 2003 至 2010 年间这 62 名省级负责人就地域而言的晋升模式相关的信息。在同一省份内晋升的省级负责人数量从 2003 年的 38 人(61%)减少到了 2010 年的 28 人(45%)。现在更多的领导人转而从其它省份或者中央政府中提拔。本文作者就同一时期省级负责人出生地和工作地相关性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在出生地所在省担任省级负责人的数量从 2003 年的 18 人(29%)减少到了 2010 年的 11 人(18%)。然而，有一点相当有趣，两名山东本地人姜异康（1953 年生）和姜大明（1953 年生）分别担任着山东省的负责人。

表 5 省级负责人晋升模式的变化(2003-2010)

	省级负责人, 2003		省级负责人, 2010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从本省晋升	38	61.3	28	45.2
从其它省晋升	14	22.6	22	35.5
从中央政府晋升	10	16.1	12	19.4
总计	62	100	62	100

注释与来源：2003 年的数据来自于李成的《现任省级领导人分析》，《中国领导观察》，第 7 卷（2003 年夏季），第 12 页。

教育背景

第四代和第五代领导人的一大区别就是他们的教育背景。第四代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接受过研究生教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领导人大部分接受的都是文革之前工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第五代领导人很多都接受过研究生教育，其中通常是在职教育，而且很多人都拥有博士学位。他们的学术领域相当多元，很多人学习过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或者法学。在 62 名省级负责人中这种新趋势十分明显。表 6 显示，有 40 名领导人(64.5%)拥有高级学位。2001 年时，只有 8 名省级负责人(13%)参加过研究生教育（通常获得硕士学位）。¹⁸ 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任省级负责人中有 8 人拥有博士学位，分别是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1952 年生）、陕西省省长袁纯清（1952 年生）、天津市市长黄兴国（1954 年生）、新任命的青海省省长骆惠宁（1954 年生）以及上面提及的王珉和孙政才。

表 6 省级负责人的教育背景（截止到 2010 年 2 月）

	人数	百分比
教育层次		
博士	7	11.3
硕士	33	53.2
4 年制大学	21	33.9
2 年制大学	1	1.6
总计	62	100
学习专业		
经济/管理	17	27.4
政治学/中共党务	16	25.8
工科	15	24.2
法律	3	4.8
商业	2	3.2
中文	2	3.2
历史	2	3.2
新闻	2	3.2
农业	1	1.6
哲学	1	1.6
物理	1	1.6
总计	62	100

来源：新华社，作者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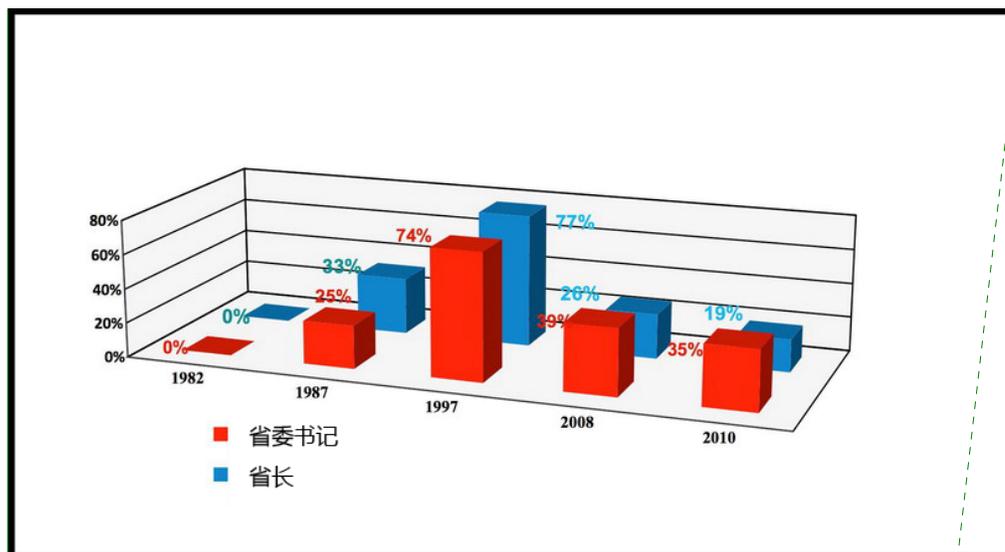
有一点值得指出，这些省级负责人获得的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大部分都是在职的，事实上，很多人是在中央党校获得的高级学位。近年来，全国上下都在强烈批评这种“假学历”。近来中国官方媒体曾呼吁官员们做到“学历清清白白”。¹⁹ 中国媒体也曾报道说，某些高级官员甚至是从一些被批评为“国外冒牌大学”的院校获得的“高级学位”。据说，这些“高级学位”资格，比如EMBA，是不被美国教育部承认的。²⁰ 近期被控腐败而遭清洗的两名高级官员，即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和文化部前副部长于幼军，都是通过此类途径获得的学位。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王珉于 1983 至 1985 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全日制）。王也曾在 1987 至 1989 年间在香港科技大学作访问学者。在 62 名省级负责人中，只有 3 人（其中包括王珉）据称曾在海外学习过。其余两人是专业为经济管理的巴特尔（1989 至 1990 年在东京作访问学者）、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曾参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未来领导人培训计划）。没有人获得过海外的学位。

表 6 还显示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中共党务是最常出现的学术领域。33 名省级负责人(53%)毕业于这些专业，15 人(24%)专业为工科。与此对照的是，2001 年时，39 名省级负责人(63%)接受的是工科教育，只有 6 人(9.7%)学习的是经济学、政治学或者中共党务。²¹图 2 显示，从 1982 年至 2010 年，技术型官员（接受过工科或者自然科学教育）在省级负责人中的比例显著增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和九十年代，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内经历了“技术型官员接班”的过程。1982 年，技术型官员——拥有大学水平技术教育的干部——在中央委员会中只占 2%，但到了 1987 年，这一比例飙升到了 25%。到了 1997 年，他们占据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半多。²²2002 年当选的 9 大政治局常委都曾经是工程师，其中包括最高级的三位领导人，即总书记江泽民（电子工程师）、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土木工程师）和总理朱镕基（电子工程师）。现任的三位最高领导人也是如此：胡锦涛（水利工程师）、吴邦国（电子工程师）、温家宝（地质工程师）。这一时期内，省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长官中技术型官员所占的比例也迅速增长。近期省级负责人中技术型官员有所减少，这说明技术型官员在中国政治领导层的统治时代将要结束。下届政治局中，成员的学科领域可能会更为多元。

图 2 技术型官员在省级负责人中的比重变化



Comment [NL1]: Please change the "省委书记" after the red cube to "省级党委书记", and change the "省长" after the blue cube to "省级行政长官".

来源：作者数据库。

职业道路、领导经历和政治派别

绝大多数现任省级负责人都属于所谓的“失落的一代”。这一代人在文革（1966至1976年）中度过了他们的成长时期，失去了接受初高中教育的机会。相反，很多人成了“下乡青年”，青少年时期就从城市被派往遥远的乡村，在多年甚至是文革的整整十年里从事体力劳动。23名省级负责人(37%)——包括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海南省省长罗保铭（1952年生）和上海市市长韩正（1954年生）——都曾有过这种经历。例如，新任命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1952年生于浙江省慈溪市，但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却在偏远的黑龙江省度过了13年的光阴，其中大约有4年都是在从事农场劳动。

多名省级负责人都来自农民家庭。例如，天津市市长黄兴国1954年生于浙江省象山市的农村地区，他是在当地的人民公社开始政治仕途的。与此类似，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儿是17岁时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作为放牧人开始职业生涯的。很多省级负责人即便没有下乡的经历，也都有曾在职业生涯早期在底层工作的经历。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1950年生）曾是码头工人；山西省省长王君（1952年生）曾是煤矿工人；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飏曾是钢铁厂工人；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是化工厂工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1951年生）曾是化肥厂工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是食品加工厂工人。多名省级负责人是作为士兵开始职业生涯的，其中包括青海省委书记强卫（1953年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江苏省省长罗志军（1951年生）、宁夏自治区委书记陈建国和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

文革造成的特殊生活经历对每一名领导人都有持久的影响，并且整体上对第五代领导人有一种独特的集体冲击。这一代领导人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不同，因为文革开始前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都已经完成了大学教育。还有一点应当指出，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而言，第五代领导人整体上与未来的第六代领导人也有深刻的差异。第六代领导人是在一个物质上相对丰富的时期里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的，很少需要面对上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和挫折。也有迹象表明，第五代领导人的艰苦贫贱经历使他们培养出了极为宝贵的个性，如坚忍、适应性强和谦虚。正如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说，“我只是成千上万个下乡青年中的一员，我和我的下乡青年伙伴之间没有多少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我足够幸运，抓住了给予我的机会。”²³

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了一项针对中国31名现任省级行政长官的研究，其中显示，这些领导人中有77%开始职业生涯时都是下乡青年、工厂工人或士兵，几乎没有白领职员。²⁴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平均年龄是23岁，开始担任政府官员工作时平均是29岁，升到省级行政长官职位时平均是54岁，现在平均年龄是57

岁。该报告强调，平均而言，这些领导人在担任省级行政长官之前都曾有过 25 年的领导经验。

表 7 列出了 31 名现任省级行政长官的主要工作经历。根据他们的官方简历，作者将他们的经历按 9 个功能区域进行了分类：农业工作、工业工作、外贸、金融、中共组织（人事）工作、宣传、学术研究、秘书工作（包括担任个人助理、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和共青团官员工作。表 7 显示，这些领导人中几乎一半都拥有农业工作经历，作为县长负责农业事务，但只有五分之一拥有工业工作经历，担任厂长或者省/市级政府中工业局的局长。只有五分之一拥有外贸领域内的管理经历。只有两名领导人，即上海市市长韩正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负责过金融事务。只有一名领导人，即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飏，拥有学术领域的领导经历。他在 1982 至 1991 年间担任广西政府属下的计划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和副所长，在 1991 至 1994 年间担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主任，之后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上述省级行政长官几乎有一半都曾担任过县、市或省级的党组织部或宣传部部长。

表 7 31 名现任省级领导人的主要工作经历

					经历过的工作领域				
领导人	农业	工业	外贸	金融	组织	宣传	学术研究	秘书	共青团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	X					X			
天津市市长黄兴国	X					X		X	X
河北省省长陈全国	X				X			X	
山西省省长王君		X							
内蒙古区主席巴特尔	X								X
辽宁省	X					X		X	X

长陈政高									
吉林省长王儒林	X							X	X
黑龙江省长栗战书	X				X			X	X
上海市长韩正		X	X	X				X	X
江苏省长罗志军						X		X	X
浙江省长吕祖善		X						X	
安徽省长王三运	X				X			X	X
福建省长黄小晶									X
江西省长吴新雄	X	X							
山东省长姜大明	X				X			X	X
河南省长郭庚茂	X								
湖北省长李鸿忠		X	X					X	
湖南省长周强								X	X
广东省长黄华华								X	X
广西区主席马飏	X						X		
海南省			X			X			X

长罗保铭									
重庆市长黄奇帆		X	X	X				X	
四川省长蒋巨峰	X					X		X	
贵州省长林树森	X		X					X	
云南省长秦光荣					X				X
西藏区主席白玛赤林								X	
陕西省长袁纯清								X	X
甘肃省长徐守盛	X				X				
青海省长骆惠宁			X			X		X	
宁夏区主席王正伟						X		X	
新疆区主席努尔白克力						X		X	X

有一项有趣的发现，那就是有多达 21 名省级行政长官(68%)有过秘书工作经历，这一统计数字反映出了庇护关系在中国精英选拔中的重要角色。有些人职业生涯初期就是担任前任高级官员的个人助理。例如，湖北省长李鸿忠就是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秘书；湖南省长周强曾经是前司法部长肖扬的秘书；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省长蒋巨峰职业生涯初期都是各自省级政府办公室的秘书（刘在安徽，蒋在浙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的晋升之路几乎完全是靠秘书工作。姜在职业生涯早期做过多年秘书工作之后，于 1988 年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1995 至 2002 年间，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之后被任命为重庆市委副书记。

表 7 还显示，16 名省级行政长官(52%)有过担任县级领导层以上中国共青团官员的经历。那些从共青团内获得晋升的人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直接在胡锦涛手下担任省级和国家级共青团官员的人通常被称为“团派”（共青团派系）。本研究也审视了 1993 至 1998 年间李克强负责中国共青团时那些担任省级和国家级共青团领导的那些人。但是，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并不是所有这 16 名担任过共青团官员的省级行政长官都应被划分为“团派”。有些人从未担任过省级或国家级的共青团领导，因此并不符合划分条件。上海市市长韩正虽然曾担任上海市团委书记，但并不属于“团派”，他的升迁主要是靠和上海帮的关系。

然而，这些担任过共青团官员的省级行政长官中，有 13 人确实属于团派。表 8 显示，省级负责人中团派的人数 2003 年时为 6 人(9.7%)，2005 年时增加到了 13 人(21%)，2010 年时增加到了 21 人(33.9%)。团派成员大量占据省级领导层并不令人惊讶。在中共第 17 届中央委员会中，86 名领导人(23%)可以被划分为团派，其中包括正式委员和替补委员。本研究认为，胡锦涛和李克强的追随者可能将继续在下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占据很大一部分席位。

当然，现在及 18 大之后，无论是在省级领导层中，还是在国家级领导层中，团派都无法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其他前任或现任最高领导人的亲信也都在省级领导层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被公认为是江泽民的亲信。新任命的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被认为是贾庆林和曾庆红的亲信。具有高干家庭背景的“太子党”领导人经常在省级领导层中与团派争夺重要职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省级领导层中“太子党”利益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尽管“上海帮”的人数在省级领导人中非常少，但是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仍然被他们占据，如上海市市长韩正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太子党成员和上海帮成员通常在经济管理、外贸和金融方面拥有更加丰富的管理经验。俞正声和薄熙来之前曾分别担任建设部部长和商务部部长，韩正和黄奇帆则是省级最高领导人中少有的金融专家。他们这种难得的专业资格和领导技巧很可能会使他们成为未来的领导层更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选。

表 8 省级负责人中团派比重的增长(2003-2010)

年份	省级党委书记 (31 人)		省级行政长官 (31 人)		总计 (62 人)	
	人数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2003	3	9.7	3	9.7	6	9.7
2005	6	19.4	7	22.6	13	21.0

2010	8	25.8	13	41.9	21	33.9
------	---	------	----	------	----	------

来源：作者数据库。

2012 年政治局席位的省级有力竞争者

中国的 31 个省级行政区级别相同，但它们并不平等。某些行政区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承担比其它行政区更多的份量。对于 62 名省级负责人而言，情况亦是如此，他们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权势，影响更大。通常来说，省级党委书记在权力图腾柱上的位置比省级行政长官高，毫无疑问，担任政治局委员的 6 名省级负责人是当中最有权势的。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和上一个十年加入的重庆）的市委书记按惯例在政治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广东同样如此，广东省现任省委书记汪洋和之前的三任（谢飞、李长春、张德江）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都进入了政治局。²⁵过去 20 年间，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辽宁、河南、湖北、四川和新疆等省内这种情况也日益显著。例如，4 名现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习近平、贺国强和王兆国）之前都曾担任过福建省负责人。如果省级负责人职位是未来晋升的跳板，那么在上述省或直辖市任职基本上可以视为进入政治局的入场券。

表 9（见下页）列出了这些现任省级负责人中最有可能进入下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候选者。这份列表根据 3 项标准提出：他们各自的年龄；他们目前供职的省市自治区；他们出于当前中国领导层政治权力平衡规则而归属的派系。后邓小平时代的精英政治可以从广义上概括成两大主要联盟的争斗，即“平民联盟”和“精英联盟”。²⁶这两大联盟因其成员的家庭背景、职业道路和政治联系而有所不同。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陆对阵沿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国家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利益。平民主义联盟的核心是上面讨论过的团派，精英主义联盟则主要由太子党和上海帮成员组成。

这 13 名领导人中，有 11 人目前担任省级党委书记，其余两人（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和上海市市长韩正）之前曾担任过省级党委书记。郭曾于 2004 至 2007 年间担任安徽省委书记，于 2000 至 2004 年间担任西藏区委书记。韩曾在 2006 年末至 2007 年初担任过数月的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在列出的 13 人中，4 人是现任政治局委员。汪洋、薄熙来和张高丽可能在新一届政治局中保留他们的席位。他们三人都有很大的机会成为政治局常委。由于汪洋年纪相对较轻，他将可以在 2012 年后担任两届常委。这将有可能使汪成为未来中国领导人排名中极少数最具政治份量的人物。

如果下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出生年份上限是 1945 年，则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将可以保留他在下届政治局中的席位。考虑到他已经担任过两届政治局委员，他极有可能获得一个政治局常委席位。俞的老资格使他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政治人物，类似于第 15 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李瑞环或者第 16 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曾庆红。然而，由于俞潜藏的巨大权势，胡锦涛和其他现任高层人物可能会试图在 18 大上协谋让他退休。

胡春华和孙政才都生于 1963 年，他们被中国官方媒体广为报道，被视为所谓的“第六代领导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过去 20 年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担任西藏共青团的高级官员开始，胡春华的晋升之路大部分都应归功于胡锦涛的强力支持。媒体特别提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胡春华能够讲流利的藏语。²⁷为了与胡锦涛对胡春华的庇护相抗衡，贾庆林和曾庆红在孙政才的迅速晋升之路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似乎两大竞争联盟之间达成了一项政治交易，让这两名更年轻的人进入新一届政治局。这不仅将维系各个派系之间的权力平衡，还可被视为第五代领导集体延伸其连续性的集体行动。

表 9 省级负责人中下届政治局的有力竞争者

姓名	出生年	现任职务	中央委员会职位，任命时间	下届政治局前景	主要领导经历	派系归属
汪洋	1955	广东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6 大开始	常委	重庆市委书记(2005-2007)、国务院副秘书长(2003-2005)	平民派（团派）
薄熙来	1949	重庆市委书记	委员，16 大开始	常委	商务部部长(2004-2007)、辽宁省省长(2001-2004)	精英派（太子党）
张高丽	1946	天津市委书记	候补委员，15 大开始	常委	山东省委书记(2002-2007)、深圳市委书记(1997-2001)	精英派
俞正声	1945	上海市委书记	候补委员，14 大开始	常委	湖北省委书记(2001-2007)、建设部部长(1998-2001)	精英派（太子党）
胡春华	1963	内蒙古区委书记	委员，17 大开始	委员	河北省省长(2008-2009)、共青团中央书记(2006-2008)、西藏区委副书记(2003-2006)	平民派（团派）
孙政才	1963	吉林省委副书记	委员，17 大开始	委员	农业部部长(2006-2009)、北京市委秘书长(2002-2006)	精英派
刘	1953	四川省委副书记	候补委员，16 大开始	委员	广西区委书记(2006-2007)、国务院副秘书长(2003-2005)	平民派（团派）

奇葆		委书记	开始		书长(1994-2000)	团派)
姜异康	1953	山东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 16大开始	委员	重庆市委副书记(2002-2006)、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5-2002)	不明
郭金龙	1947	北京市市长	候补委员, 15大开始	委员	安徽省委书记(2004-2007)、西藏区委书记(2000-2004)	平民派
韩正	1954	上海市市长	候补委员, 16大开始	委员	上海市委代理书记(2006-2007)、上海市委副书记(2002年至今)	精英派(上海帮)
卢展工	1952	河南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 15大开始	委员	福建省委书记(2004-2009)、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98-2001)	平民派
孙春兰	1950	福建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 15大开始	委员	全国总工会党委书记(2005-2009)、大连市委书记(2001-2005)	不明
王珉	1950	辽宁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 17大开始	委员	吉林省委书记(2007-2009)、吉林省省长(2004-2007)、苏州市委书记(2002-2004)	精英派

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在国家两个最重要的省份担任一把手。两人都有丰富的中央政府内部领导经验，都是下届政治局候选人中的领先者。过去30年里，北京或上海的市长通常都会进入政治局，有时甚至会成为政治局常委。郭金龙拥有广泛的省级领导经历，韩正长期管理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这些都是他们极为宝贵的资本。但如果他们想要获得下届政治局的席位，那么今后两年内他们就都需要转任各自城市的党委书记或者调到其它重要的领导位置。卢展工、孙春兰和王珉是与前面提到的胡春华和孙政才一起在2009年11月获任现有职务的，这一职务变动使他们在加速谋求政治局席位中抢占先机。正如前文所述，在即将到来的政治角逐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优势。

2012年中国领导层的主要竞争者已经开始进行个人竞选活动（当然是以中国的方式）。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完全掌权之前，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可能不会显示出他们与前任有何不同。但是尽管如此，已经有迹象表明习和李都代表了新的领导方式，并且愿意寻求新的政策优先顺序。例如，2010年春节期间，习通过短信向中共近100万名基层组织的官员们表达他“个人的”祝福，这是一种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地方官员进行沟通的新方式。²⁸同时，李也因其对诸多新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医疗保健、经济适用房）的强烈关注而引人注目。所有这四个问题对于10年前的中国领导人而言都不在优先考虑之列。

汪洋和薄熙来都以敢言著称，人送绰号“两个大炮”。自从2007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以来，汪洋就一直提倡一种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或模式），并坚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个人发起了一波新的“思想解放”，敦促地方官员克服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禁忌。在2008年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汪洋引用了邓小平对经济改革面临的巨大困难的描述，说政治改革可能是一条“血路”。²⁹今年年初，中国官方媒体对一篇描写汪洋的长文进行了大肆转载，并且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该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属下的《大地》周刊。³⁰这篇文章强调了汪出身低微，但更重要的是，该文重点提出了是邓小平“发现”的汪洋，1992年邓视察安徽时，遇到了这名时年37岁的铜陵市委书记。文章引用邓的话说，“汪洋是个难得的人才。”文章结尾预测，作为一名拥有“鲜明的团系色彩”的政治局委员，汪洋未来会有更加光明的政治前景。在中国的政治和媒体文化中，对一个省级负责人如此大肆报道实属罕见。

薄熙来的“自我推销运动”则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现在他以极具个人色彩的两大倡议著称：“打黑唱红”。该口号的上半部分指薄去年在重庆发起的一次警方严打运动，其间逮捕了他所说的“地下黑社会匪帮”，这些人通常都有腐败的执法官员保护。在薄从辽宁带来的亲信（现任重庆公安局局长）的帮助下，薄发动了这个城市的3万名警力，逮捕了许多“黑社会成员”和腐败官员。薄把前任公安局长（也曾任重庆市政府司法局长）送上了审判庭。根据《重庆晚报》的消息，薄曾指示说，该市警察的目标是逮捕该市的大约9000名罪犯。³¹

至于“唱红色歌曲”，薄要求重庆的官员和普通居民通过唱革命歌曲来振奋精神。正如很多国内外记者所看到的那样，这是薄熙来展示其太子党出身的一种方法，让民众认为这种出身使他有资格成为他父亲那一代建立的红色政权的理想继承人。³²同时，薄熙来向500万名退休老干部、残疾老兵和城市贫民派发了总计6亿元的“红包”。³³尽管有批评认为这些办法反映了薄熙来的“文革式思想和行为”，薄似乎却在重庆公众中大受欢迎。在全国层面上，薄的高调使他赢得了《人民日报》发起的2009年网络评选“年度人物”称号。³⁴

然而，其他高层竞争者仍保留着一种更为传统、不太张扬的领导风格。例如，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最近就曾对国外人士说，他更喜欢“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风格，他的座右铭是“多干事，少说话。”³⁵上面讨论的所有这些行为——有些很新鲜，有些则更熟悉——都反映了中国精英政治中的活力变化。

在痛苦的同时却仍具和平希望的政治转变中，这个国家也许很快就会见证一个更有活力、甚或更加“两党化”的阶段。一个新的领导层出现时，巨变似乎不可避

免，而上面描述的省级领导人几乎肯定会站在这些变化的最前沿。围绕这次即将到来的领导层更替存在整体上的不确定性，这次更替也将对中共的派系动态造成深刻影响，这一切都标志着 2012 年极有可能会是中国精英政治中尤为有趣的一年。本专题关注通往 18 大道路上发生的政治角逐，后续文章将审视一系列其它可能影响该事件结果的因素，并预测其可能会如何重新定位中国近期和长期的政治前景。

注：

*作者感谢李银生（Yinsheng Li）的研究帮助，也感谢乔丹·李（Jordan Lee）和马修·普拉特金（Matthew Platkin）就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提供的建议。

¹ 例如，在 11 人的中央军委中，有 8 人（包括两位副主席）预计将会在第 18 届党代会上让位。

²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 2002 年 7 月下发文件《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8/content_695422_1.htm。然而，例外的确曾出现过。例如，习近平 2007 年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之前，仅担任过 8 个月的上海市委书记。

³ 中国有 31 个省级行政区，包括 22 个省、5 个自治区和 4 个中央政府直辖市。这些自治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广西）和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拥有省的地位。本研究将这 31 个省级实体的党委书记和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直辖市市长）统称为“省级负责人”。

⁴ 参见 <http://www.xinhuanet.com>。与省级负责人的家庭背景和庇护-受庇护关系相关的信息来源于作者在中国进行的访谈和海内外非官方网络媒体。

⁵ 更多相关讨论请参见李成所著“After Hu, Who?—China’s Provincial Leaders Await Promotio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 (Winter 2002).

⁶ 《河南日报》，2010 年 1 月 11 日，第 1 版。这些人口超过 1 亿的国家是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墨西哥。

⁷ 同上。

⁸ 参见 <http://city.cctv.com/html/chengshijingji/88645f7c0d8c2c294837385a15b0fe9c.html>。

⁹ 参见《瞭望新闻周刊》，2010 年 1 月 23 日。

¹⁰ 他们中的 5 人（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汪洋和王岐山）在 17 大上获得政治局席位，当时他们均在省或市的党委书记任上。那时候，另外一名正在上升的明星薄熙来是商务部部长，也有担任过数年辽宁省省长的领导经历，17 大之后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

¹¹ 每个省级行政区在中央委员会中都拥有 2 个正式委员席位，这一政治标准自 1997 年的 15 大上开始实施。参见李成所著“A Pivotal Stepping-Stone: Local Leaders’ Representation on the 17th Central Committe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23 (Winter 2008)。

¹² 李成，“China’s Communist Party-State: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Power,” in William A. Joseph (e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第 186 页。

¹³ 2002 年党代会之前，曾庆红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职位在 2002 年的政治局会议上被废除。

¹⁴ 参见 <http://www.daynews.com.cn/sjdsb/Aban112/A11/878237.html>。

¹⁵ 政治局中的现任女性成员刘延东可能在新一届任期中保留席位。

¹⁶ 该法律在 2004 年的修订见 <http://www.seac.gov.cn/gjmw/zcfg/2004-07-10/1168742761853498.htm>。

¹⁷ 例如，参见李成和 Lynn White 所著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38, no. 3 (March 1998): 231–264; and Zang Xiaowei, “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Technocracy or Political Technocracy,”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87–803.

¹⁸ 参见李成所著“After Hu, Who?”, 第 19 页。

¹⁹ 参见<http://www.daynews.com.cn/sjdsb/Aban112/A11/878237.html>。

²⁰ 《世界日报》2010 年 1 月 4 日, A11 版。

²¹ 参见李成所著“After Hu, Who?”, 第 19 页。

²² 李成, “China’s Communist Party-State,” 第 179–180 页。

²³ 《瞭望东方周刊》, 2005 年 6 月 26 日。

²⁴ 《济南日报》, 2010 年 2 月 2 日。

²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多个重量级政治家, 如赵紫阳、叶剑英、习仲勋和陶铸, 都曾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

²⁶ 作者对“一党两盟”分析框架的详细讨论见李成所著“China’s Team of Rivals.”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9): 88–93。

²⁷ 参见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4-15/110817614496_3.shtml。

²⁸ 这条短信的准确文本见<http://news.sina.com.cn/c/2010-01-06/114619410949.shtml>, 也可参见《世界日报》, 2010 年 1 月 7 日。

²⁹ 参见<http://news.sohu.com/20080219/n255223638.shtml>。

³⁰ 《大地周刊》2009 年第 23 期, 也可参见 <http://news.hexun.vnet.cn/2010-01-02/122228741.html>。

³¹ 《重庆晚报》, 2010 年 1 月 16 日。

³² 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8/100195.html>。

³³ 《世界日报》2010 年 1 月 8 日, A12 版。

³⁴ 《世界日报》, 2010 年 1 月 3 日, A2 版。

³⁵ Robert Lawrence Kuhn,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2010, p.230.